



滿族民俗文化探源

姚斌著

满族民俗文化探源

To seek the source of Manzu's folk ways culture

姚 斌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姚斌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民俗文化探源/姚斌 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644-981-7

I. 满… II. 姚… III. 少数民族风情系列

IV. K892.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88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丹东天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850mm×1168mm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出版时间: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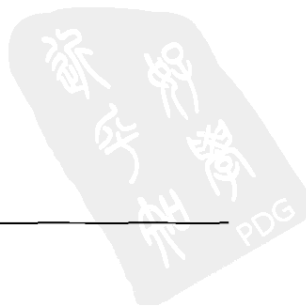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静 冬

封面设计: 张双凤

装帧设计: 赵 婷

责任校对: 静 冬

定 价: 25.00 元



老人与礼帽

——也作《满族民俗文化探源》的序

高峰

在延边大学读中文的时候，读过日本川端康成的小说《名人》，描写了上世纪本因坊秀哉名人的事，这是一生中只输过一盘棋的棋苑高手，得了本因坊的名，并可世袭；后来作大学的讲义时，又细研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那个与大海和大鱼搏斗的桑堤亚哥印象极深。这两位毕其一生于一事的老人，象家族中未曾谋面的先者，挺直的背影在我的前方无声而行，让我一生去追寻。

而此后，我在宽甸工作期间，结识了这位姚斌老人。

这是一位喜欢穿中山装的老人，冬天喜欢围米色围巾，印象最深的是他四季都喜欢戴着一顶礼帽，或单或棉，成为小城的一道风景，也似乎成了一个文化的象征。

他受过磨难，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却越发炽热，对文化的探索也越发执着。他做教师，告诉学生爱国忠诚不可改，为人尊严不可丢；他退休了，往来全市全省做爱国主义报告百余场，听众十余万人次；晚年，他致力于地方史和民族文化的发掘、研究和整理，著书立说，以启示后人。他身居陋室，陪伴的是书香和灯光，虽孤单却温暖，但温暖也孤单；他奔赴各地讲座，清水一杯足矣，茶饭饱腹即可；他查史询往，一本一笔，得之欣欣然，失之也惘然。他的《边烽遗恨》，详实而艺术地描写了活跃在宽甸的女真族董鄂部的战斗史；他的《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解释了许多宽甸人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往事；他的宽甸地名研究、宽甸民族文化研究，在某些领域甚至胜过了当地研史的专业部门和人员；这次，他又推出了《满族

民俗文化探源》一书，更是超越了地域的界限，衍生到更宽的领域，让我见识了一位 80 岁老人的睿智、坚韧和执着。

单谈这部书吧，不论作为满族的后裔还是一般的人，读来都觉得生动和温暖。那些风俗不经意间就会触动我们的敏感神经，透过看似繁琐的礼节见到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慨叹，对生命的无常和有价的感慨。丧俗本是引人避讳的，但姚斌老人娓娓道来，平淡而从容，那些繁琐的丧俗礼节与简单的生命过程，讲述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书中用更多的篇幅讲了满族一年十二个月的节日风俗，这让我们读来有重生的感觉，仿佛沿成长的足迹又重走了一遍，象幻想中的时光隧道，但又不是那么迅疾，而是舒缓地回到从前。除夕的喜悦，端午的怀古，中秋的略带伤感，重阳的悲秋与高壮，甚至那些仅模糊留于记忆的腊八粥、填仓的馒头，等等，让我们读来恍如昨天。生命原是如此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而我们却是在哪些时候不经意将他们丢掉了呢？对生命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爱，点燃了姚斌老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烛火。

属于谈史的学术的著作，姚斌老人却写得如此恬淡，严谨中洋溢着内敛的热情，难怪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身上没有一点刻板。

“终于下完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完最后一盘棋如释重负。

“一头狮子在散步”。桑堤亚哥终于将大鱼的骨骸拖到岸边后酣睡中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而姚斌老人在想些什么呢？我们只好揣测，似乎他那顶总不舍得摘下的礼帽，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承蒙姚斌老人抬爱，嘱我写序，对人对文，我皆不敢妄评，谈一下对姚斌老人的感觉。更深的，让我们一起，慢慢去品味罢。

谨以此为序。

2006 年 12 月 1 日

注：杨峰同志是丹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原任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感谢并铭记

——也作《满族民俗文化探源》的序

姚斌老师又出了一本书。

这是继《边烽遗恨》、《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后又一本宽甸人写宽甸史的书。

书的内容，读来熟稔而亲切，虽是说史，却流淌着生动的内容，仿佛引我们回到久违的生命，焕发了心底的感动。对地方民俗如此了如指掌并能饱含深情地讲述给我们，可见姚斌老师多年的文化积淀和良苦用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姚斌老师虽然一生坎坷多难，荣辱升沉，但他胸怀广阔，心境平和。拜读《满族民俗文化探源》，娓娓道来，不温不火，文风从容。大美无言，大善无言。这是一种大家的风范。

文化是一个地区生命的血脉，对此姚斌老师肯定是深得真谛。他教史著说，把民族的自尊自强，把对家乡的至亲至爱，把对生命的认知和感受，都凝于笔端，汨汨流淌成一条文化之河。联想此前他对宽甸满族史的研究——建州女真董鄂部在宽甸纵横驰骋的足迹；他对宽甸地名的研究——步达远是满语“饭，驿站”的意思，牛毛生是满语“细鳞鱼”的意思；到今天他对满族风俗的研究——插艾蒿、抓“疙啦哈”，每个细节都隐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感受。“为什么我眼里常噙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艾青老人的话，引起我们诸多感慨，也让我们略微理解了姚斌老师内心深处的情怀。

宽甸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事实上，很多人在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忽视着文化，以各种看似堂皇的理由让文化退缩一隅。感谢

姚斌老师，他让我们再次感到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文化的敬畏。我们一再强调以人为本，一再强调可持续发展，一再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何等重要！文化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石，文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形象，就像一个人的文化影响人的一生一样。宽甸的历史文化久远，民俗文化丰富，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重视并挖掘民俗文化对提升宽甸文化底蕴，塑造地区文化形象，发展地域文化，打造旅游大县品牌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姚斌老师以此著书，这是对宽甸民俗文化十分珍贵的历史传承，是对宽甸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宽甸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姚斌老师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人，又是一个在文化领域里默默耕耘的人，更是对家乡宽甸充满无限热爱的人，宽甸经济文化振兴需要这样的人。

注：卢秉宇同志现任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著者前言

民俗是产生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语言和精神文化及其所体现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传统的总合。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具有坚韧的历史传承性和不变性(即传递性),它包括居住、饮食、服饰、婚丧、礼仪、岁时、宗教、祭祀以及人际关系的社会行为等。研究这些内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以及消亡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科学就是民俗学。它是人文科学中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民俗学是边缘科学,它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和宗教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和重合。民俗文化是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并形成牢固的共同心理、共同理念包括语言、哲学、信仰、神话传说、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的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生活中形成的对人生的吉凶、祸福、顺逆、忧乐、爱憎、生死和禁忌等的信仰心理,并把这种信仰心理附会于某些自然物和自然力的非人间形式的思维观念,同时在心理上和精神上起着一定决定的支配作用的文化意识形态。

民俗,它综合地反映了各民族历史的科学文化水平、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正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所以有着极强的继承性和传递性。来自社会成员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起民俗文化在传递过程中有不同的增减、演变,这就是旧的民

俗文化衰亡,新的民俗文化产生并代替了旧民俗文化而传递下去的主要原因。这种演变的历史发展从而给改造旧民俗文化传统使其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新民俗文化提供可能条件。因为民俗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意识的产物,所以它具有综合地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包括社会状况、经济状况、民族心理状况和宗教信仰状况等)的功能。所以,对民俗文化的探索和研究的目的是从中找到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地理面貌、社会形态、民生生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情况,是打开一个民族社会历史之门和改造旧民俗文化的一把钥匙。

所以,民俗文化就是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体的民俗风情,包括风俗(婚嫁丧葬)、信仰(宗教、祭祀、礼仪)、价值观(吉凶、祸福、顺逆、爱憎)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胎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尽管民俗文化中存在一些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消极内容,但它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民俗文化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的产物,所以它必然带着一定的历史印记来到现代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一切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册253页)也正是这个“巨大的保守力量”,才形成为一个民族的不可摧

毁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个力量使一个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

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武装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为消灭中国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他们首先要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处心积虑地在日历上不印中国的夏历月日和传统节日，只印有阳历的月日。日本殖民者认为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就不知道传统节日和按民俗行事了，而不能知道四立八节，从而不能过年过节而淡忘了中国民族的传统，也忘了中国，以达到日本殖民者消灭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进而就会服从日本殖民者的统治而不反满抗日了。但与日本殖民者的愿望恰恰相反，虽然日历上没有夏历月日，但中国人照常按时地庆祝春节(过年)、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就连庙会、上坟都毫无差错地按时进行。日本殖民者终于明白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不是“日历”印不印中国夏历所能消灭的，它是中国人民的民族心，只要中国人民存在，民族传统就存在，它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民族心”之中，它不能改变更不能消灭。日本殖民者实行了二年的非驴非马式的日历，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阴、阳合历的日历。这就是民俗文化的巨大力量，这个力量表明民俗文化与产生它的民族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都是一体的，尽管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些变异和增减，但不会被消灭。民俗文化是不能用什么命

令或武力所能改变或消除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有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五千多年的民俗文化传统。这个优秀传统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不管政治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坎坷蹇滞，民俗文化却一以贯之地传递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民俗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自古以来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强调民俗的重要作用。

“民俗”这个概念在中国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说文》解释“俗”字是：“俗，习也。从人谷声”。也就是“人的习惯”，说明有人存在就有民俗文化存在；《康熙字典》解释“俗”字是“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礼记·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就是说：确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支使人民做什么要根据民间习惯。后汉应邵解释“使从俗”说：“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所以入国而必问俗也”（《礼记·曲礼上》，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1页），又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同上书第14页）。可见，民俗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将民俗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他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管子·正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管仲认为：要治国就要“察民俗”，知道“治乱之所生”和“得失之所在”，然后才

能治理好国家。

战国时韩非主张：“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仓廩虚而民又以淫侈为俗，则国之伤也”（《韩非子·解老》，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139页）。这里韩非也认为民俗“淫侈”，“国必大伤”，所以民俗的“邪”、“正”是国之大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这样一则故事：楚国人民喜欢矮车，楚王认为矮车驾马不方便，要下命令改为高车，楚丞相孙叔敖劝楚王不要下命令，命令太多老百姓不知所从。为了不用命令而让老百姓自己改为高车，于是孙叔敖向人民宣讲加高门槛的好处，可以分内外，防敌人，于是老百姓都将门槛（即门坎儿）加高。门槛加高，上下车就要车也高，所以不到半年楚国都是高车了。由此，可见改变民俗不能用行政命令，要让人民自己认为应该改掉旧习惯，才能顺利地改变，发展新习惯。

清朝在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国家积弱、落后挨打而产生一些致力于发奋图强、主张维新改革的思想家，当时户部郎中梅曾亮在《送周石生序》中说：“奋白笔（古时当官的随身携带的笔叫白笔，唐朝规定七品官以上以白笔代簪）书盈尺之纸，为国家陈民俗之急”（梅曾亮著《柏枧山文集》）。梅曾亮所说的“民俗之急”即当时人民要清政府强硬对外、整顿吏治的要求，梅曾亮把它称作民俗。可见，民俗概念的外延很广。

清朝中后期一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都倾向维新，提出应大办实业以“救国”。当时曾担任过曾国藩、李鸿章

幕宾又出使过欧洲英、法、意、比等国游历海外，极具维新思想的薛福成在其所著的《庸庵文编》卷二中的《创开中国铁路议疏》中说：“民俗既变，然后招商承办……可以渐推渐广，渐续渐远”。在这篇《疏》中，薛福成认为改革、招商、发展实业的步骤首先要改变“民俗”，即民风变化则社会变化，民俗习惯于发展实业和铁路就能发展实业、铁路了，所以“民俗”在薛福成看来是社会改革、发展实业的基本力量。

从上述可看出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如何看重民俗，他们都将“民俗”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战国时像孟子那样著名的思想家，在他初到一个国家时，都要首先了解那个国家的社会民俗情况。他到齐国，对齐宣王说：“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这说明孟子到一个新地方首先要了解该地方的民俗风情和国家各种关于民情的规定以及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禁忌，然后才敢进这个国家。

对民俗风情，宋朝朱熹解释《诗经·国风》时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可见民俗就是一个地区的风气，这个风气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所以古代各国君主都按时派人到各地去采风。所谓采风就是察看各地民俗风情和民歌民谣，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可见民俗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国家的重视。

民俗文化生活体现在具体的外在表现就是在婚姻、丧葬、节日、宗教祭祀和生活礼仪方面，而以婚姻、丧葬和

节日最为普遍而且有顽强的继承性和传递性，而宗教祭祀及礼仪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而有大小不同的变化。

婚姻习俗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传统民俗，中国传统认为婚姻是人伦之首。《周易·序卦下》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可见，中国的古老传统认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夫妇”开始的，整个社会的“父子”、“君臣”、“上下”以及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和礼仪，都是有了婚姻的“夫妇之道”之后才形成的并且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所以是“不可以不久”的关系，因而《周易》认为夫妇之道必须为“恒”。这种认知直到现在，人们对婚姻的看法仍认为是人生最重大的事情。

我国漫长的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封建制的社会中，婚姻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婚姻制度，它贯穿于中国五千余年的民俗文化史中。婚俗文化也曲折地表现出中国各时期的婚姻习俗，也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建筑在它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本书的婚俗文化偏重于现在的婚俗与古代“六礼”传统的联系和残留的历史痕迹。

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第四卷,第 2 页。)满族的婚俗在历史发展中同世界各地种族一样,也经历了血缘婚、对偶婚和文明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尽管这个一夫一妻制中伴随着纳妾、卖淫、妓院等)。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族的上层阶层把婚姻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同上书 74 页)。在下层民众中就产生了“门当户对”的观念。满族入关后,一方面接受汉文化“礼”的传统掺入本民族的婚俗,一方面仍保留本民族的婚姻习俗。本书只叙述满族接受汉文化后的婚俗情况,其它不作赘述。

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大事”之一(中国古代所谓大事,就是丧葬、兵戎、土功和有关国家大事者),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以及历代的《礼》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各朝代的《礼》志都是根据古代“三礼”演变而来。丧葬礼仪有很多内容是古代传统丧葬制度的延续,所以,本书着重说明古传统遗留于现在仍延续行事的内容,有些古礼礼仪现在已不被采用的,未做赘述。

节日文化也是着重叙述满族、汉族共同的节日(颁金节除外)。

满族是一个善于包容、汲取一切其它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并能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民族。自与汉族文化接触后,特别是自入关之后大量的接触和汲取了汉族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而形成了在内容和形式上带有极浓厚的汉族民俗文化色彩的满族民俗文化。中国

满族从东北的一个落后的民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入主中原并建立了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政权的民族，当然有着许多的因素，但满族能胸怀广阔、无所不包地汲取先进的汉族文化，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却是个主要原因。由于满族与各族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共同生活、生产，和平相外，共同发展，相互汲取和扬长避短，所以存在于民间的一切习俗、风情、宗教、信仰、生活礼仪、岁时节令和人际关系都已互相融合相通而相辅相成地将旧民俗发展为新的民俗文化（婚、丧礼仪）。自清朝乾、嘉以后，在民俗文化上已难分出满、汉了，这就是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力量。

特别是在辽东宽甸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满族生活、繁衍的住牧之区，自十六世纪开始是满族建州女真董鄂部的活动地方。但自从皇太极时代将宽甸地区视为“龙兴之地”而加以移民限制，尤其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顺治入关后，将宽甸一带实行封禁，不准人民在此居住、开垦、种参、养貂以及射猎，此地只用作满族的王公、贵族围狩之地。直到十九世纪的同治初年，满、汉各族人民才逐渐逃荒来此垦荒耕种，才使得荒芜了二百余年的荒草萋萋、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的宽甸地区重新得到开辟发展。满、汉人民在共同垦荒耕种的劳动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和学习，不仅打破了清王朝规定的“满汉不通婚，旗民不交产”的民族分裂政策界限，而且是既“通婚”又“交产”了。这样一来，在荒芜了二百余年后的宽甸地区就开创了既是满族，又是汉族的独具特色的三江民俗文化。这个三江文

化如同黄河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代表一样，三江文化成为宽甸地区的文化特色，三江文化是祖国东陲的一枝独秀的满族民俗文化之花（三江即鸭绿江、浑江、濛江）。

著者由于特殊的原因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接触到满汉各族人家的生活、礼仪、祭祀和信仰。尽管满族、汉族已有许多民俗习惯已融合为一体，但仍存在各自的特点。这些古老习俗世代相传，现在的人只知道按照老祖宗的办法做，但很多岁数年轻的人却不知道传统民俗行事的原委，或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也只是认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所以，人们只知道按传统行事而不知其所以然。正如《周易》所说的：“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第五章）。所以，民俗是代代相传而来，祖祖辈辈的世代相继，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产生和发展。这也是著者久已想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

民俗文化中有一些内容是消极的，对此应毫不留情地去除，但民俗中那些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光辉哲学理念和智慧的内容则不仅不能丢掉而且要大力弘扬。所以，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它的糟粕或精华都是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具体现状产生的，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当然也必然地存在有在今天看来是封建、迷信、愚昧和落后的内容，对此既不能奇怪也不能鄙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王朝更替的变革中，使民俗